國家發展研究　第十卷第二期
2011 年 6 月　　頁 77-116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台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

趙勳達**

收稿日期：2011 年 1 月 17 日　　接受日期：2011 年 5 月 11 日

* 本文受惠於三位匿名審查者的審稿意見，以及加拿大籍研究者史竣（Craig Smith）所提供的史料，在此誌謝。

**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專長研究領域爲台灣文學、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Email: antoniojaw@yahoo.com.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　要

日本早在 19 世紀末葉就已經誕生了大亞細亞主義，然此論述雖以團結亞洲各民族爲號召，實則爲掩護日本掌握亞洲霸權的論述。孫中山於 1924 年提出的「大亞洲主義」，便是與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對話，勇於指摘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徑，並提供亞洲弱小民族解放的大同理想，因此獲得當時殖民地台灣社會的熱烈支持。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在一戰期間、1924 年《排日移民法》通過以及 1933 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等三個時間點，有過三次的高峰期。除了第一次高峰期台人來不及參與，之後台人每每試圖與大亞細亞主義對話，甚至對抗。大亞細亞主義推動了日本帝國掌握亞洲霸權的野心，卻也同時激發了台人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的渴望，因此從 1924 年起，台人總在大亞細亞主義的論述矛盾中，援引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思想鼓吹台灣民族所應獲得的平等地位。然而，隨著時局日趨嚴峻，「大亞洲主義」的合法性也漸次衰微，到了 1937 年日本大行「大東亞共榮圈」之道，台灣社會已無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能夠滋長的空間了。

關鍵詞：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排日移民法、大亞細亞主義、殖民地台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大亞細亞主義（The Great Asianism）亦稱泛亞洲主義（Pan-Asianism），它是對泛歐洲主義的模仿，同時也對是泛歐洲主義所透露的白人優越意識以及侵略行爲的反抗。（王屏，2004：3-4）基本上，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帝國的論述，日本學界慣稱爲「大アジア主義」。至於 1924 年孫中山在神戶所做的「大亞洲主義」演講，其內容與目的都在與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對話。儘管「大亞細亞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在字面上的意義並無二致，然而從其提出的時機與內涵來看，無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述，爲求區別，本文一律以「大亞洲主義」一詞指涉孫中山的亞洲民族大同思想，「大亞細亞主義」則專指日本帝國意圖獨攬亞洲霸權的論述。

以先行研究的成果而言，研究孫中山（1866～1925）思想者多在討論孫文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抑或孫文主義的建國方針與經世藍圖，抑或孫文主義對戰後台灣民主社會的影響，反倒是鮮少觸及孫文主義對同時期的殖民地台灣的影響，「大亞洲主義」在台灣的接受狀況更是鳳毛麟角，中國學者桑兵（2009）的論文似乎是唯一的一篇；另一方面，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歷史者雖意識到孫文主義對台灣政治運動者的影響，（曾一士，2005）然亦鮮少觸及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對「大亞洲主義」的唱和。

談論孫中山「大亞洲主義」之前，必須先理解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軌跡。戰前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發展歷程，本文粗分爲三個高峰期。首先是在一次大戰期間，日本趁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大肆提倡大亞細亞主義，企圖取代歐洲列強成爲亞洲實際的霸主，此爲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一個高峰期。到了 1924 年，美國通過《排日移民法》，禁止日本以及亞洲各國人民入籍，引起亞洲譁然，此時大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細亞主義思想又起，孫中山到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便是在此時期，此爲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二個高峰期。1931 年，日本發動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遭到國際聯盟指責，日本憤而退出國際聯盟，欲以亞洲勢力對抗歐美勢力，便復倡大亞洲主義，此爲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三個高峰期。

孫中山於 1924 年所提出的「大亞洲主義」，有著歷史發展的偶然與必然，而「大亞洲主義」究竟和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有何關聯？再者，「大亞洲主義」與殖民地台灣的交會又產生怎樣的火花？這段過程且待本文一一說明。

貳、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一個高峰期

談論大亞細亞主義之前，必先理解其前身——亞細亞主義。亞細亞主義的基本論旨，在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一則排除歐美列強的干預，二則帶有亞洲「命運共同體」的特徵。日本最早的亞細亞主義，生於 1870 年代，及至「振亞社」（1878）與「興亞會」（1880）這兩個民間團體的成立，亞細亞主義才逐漸發展。1898 年，東亞同文會創立，以日本進步黨系統的政治家爲中心，並發展成日本第一個全國性的興亞組織，此時關注的焦點在中國（清朝）的改革，並以「保全東亞」爲己任。（王屏，2004：41-148）1903 年，岡倉天心（1863～1913）的《東洋の理想》（《東洋的理想》）在倫敦出版，提出了「亞洲一體」的概念，並認爲亞洲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亞洲各民族有其共通的文化傳承，同時亦具備寬容性的特點。（岡倉天心，1976：3-95）話雖如此，甲午戰後的亞細亞主義已經開始變質，日本由小國蛻變成爲東亞強國，擴張領土成爲日本官民一致的共識，日本開始有了併吞中國的野心，但礙於西方列強的覬覦，日本政府只好轉而採取「保全支那」的態度，以免中國的衰亡影響日本的前途與安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時的亞細亞主義，帶有門羅主義的特質，拒斥西人參與亞洲事務，然而亞洲事務的統轄與決斷，卻被日本視爲己任，因而引起亞洲各國反彈，亞細亞主義於是遭到挫敗。（高勞〔譯〕，浮田和民〔原著〕，1918：9-11）於是，一種新型態的亞細亞主義便應運而生，此即爲大亞細亞主義。大亞細亞主義一般認爲最早產生於 19 世紀 90 年代的日本。其早期，主要是日本國權主義團體玄洋社社員的一種主張。它的主要內容是以日本爲盟主組成日、中、朝三國「亞洲大同盟」，在日本的指導下，共同將歐美列強的勢力逐出亞洲。這種主張的提出，是經明治維新後日益強盛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表現，帶有較強的對亞洲各民族的歧視性。而後漸次發展，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理論依據。（竹內好，1963：25-28）[1] 而後，建部遯吾、大光谷瑞、德富蘇峰、小寺謙吉等人，都先後發表過關於大亞細亞主義的相關著述，而其中，又以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最爲知名，影響也最爲深遠。

小寺謙吉爲法學博士，時任眾議院議員，他在《大亞細亞主義論》中指出，大亞洲主義的目的「乃以亞洲之勢力，對抗歐洲之勢力，先宜團結黃種人中之獨立民族，漸進以鞏固各自之生存，而後努力以建設新文明，以其裨益於世界之人類爲目的者也。」（丘引夫等〔譯〕，小寺謙吉〔原著〕，1917：159）至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前提無非是日華親善（亦作日支親善），兩國在大亞洲主義的同盟下能夠互通有無，獲得最大的利益，「故日本助中國以智力，中國供日本以物品，日與中國軍國事上之援護，中國報日本以經濟上之利益。中國以農業爲本，而日本以工業爲基。中國位於陸，而日本位於海。長短互資，有無共通，則彼此並受其澤矣。誠如是也，

[1] 亦可參見龔書鐸、黃興濤，〈孫中山與李大釗〉，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71148/71165/4973105.html。2010/12/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因日本指導，爲強大之陸軍國，以保陸，而日本則以海軍護海。夫然後，黃白人種之對立，人類之平等，世界之平和，乃克實見。亞細亞文明亦將治融歐化，翻新輝煌於坤輿各處矣，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之天職蓋如是。」（丘引夫等〔譯〕，小寺謙吉〔原著〕，1917：292）當然，在大亞洲主義的構想中，日本自居領導之責（丘引夫等〔譯〕，小寺謙吉〔原著〕，1917：288），這也使得大亞洲主義透露出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正如日本學者藤井昇三（1983：216）所指出，「明治以來至大正中期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與日本資本主義跨入帝國主義相呼應」，一語道出了大亞細亞主義的本質。

一次大戰之提供了大亞細亞主義發展的土壤，原因在於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戰後又造成歐美各國元氣大傷，此時是其對殖民地的控制與對亞洲的侵略行動最薄弱的時刻，因此是宣傳大亞洲主義最適當的時機。[2] 所以日本知識界大力論述大亞細亞主義，欲以「團結的亞洲對抗分裂的歐洲」，確實也有其時代背景與合理性。於是大亞細亞主義對於長期處於歐美強權支配下的亞洲各弱小民族而言，當然是極具吸引力與號召力的。此爲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一個高峰期。

[2] 章錫琛譯〈大亞細亞主義之運命〉有言：「及此次歐戰勃發，歐美人士，遂謂日本將乘此歐人不遑東顧之機，聯合亞洲諸邦，而自爲其盟主，相與驅逐歐美人於亞洲之外。最近美人曷修氏（Boland G・Usher）所著『大亞美利加主義』Pan-Americanism 書中，尤反覆闡明此義。」就已經說明了一次大戰（歐戰）確實造就了「大亞細亞主義」宣傳的契機。（章錫琛〔譯〕，191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戒慎恐懼：中國知識界面對第一期之大亞細亞主義的態度

大亞細亞主義在一次大戰期間開始獲得日本知識界的重視並加以提倡，不過，中國知識界卻一直對大亞細亞主義懷著戒慎恐懼的態度，因而產生「日本近來有一班人，倡大亞細亞主義。我們亞細亞人聽見這個名辭，卻很擔心」的感受。（李大釗，1999a：146）此時中國知識界已陸續針對大亞細亞主義做出譯述，諸如章錫琛譯〈大亞細亞主義之運命〉、君實譯〈亞細亞主義〉、高芳譯〈新亞細亞主義〉等，也都試圖去理解這個令之萬分忌憚的論述。當然，說起大亞細亞主義相關著述，小寺謙吉的《大亞細亞主義論》無疑是其中最知名的一部，它也多次被漢譯介紹到中國。[3] 其中一部由橫濱華商印務公司翻譯發行的版本，甚至將書名定爲《併吞中國論》，可謂將「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發揮的淋漓盡致，同時也可見中國知識界對此論述的反感與焦慮。除了翻譯之外，若涉及中國知識界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批評，則以李大釗最具代表性。李大釗（1889～1927）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及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李大釗最早論及大亞細亞主義，是在 1917 年發表的〈新中華民族主義〉，文中對當時方興未艾的大亞細亞主義有如下的評價：

---

3 目前僅見的版本有：
丘引夫、陳臥子、丘天羽、何子政（譯），小寺謙吉（原著）（1917）。《併吞中國論》（原名《大亞細亞主義》）。橫濱：華商印務公司。
中國百城書舍（譯），小寺謙吉（原著）（1918）。《大亞細亞主義》。東京：百城書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顧日本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其指領何在，吾不得知。但以吾中華之大，幾於包舉亞洲之全陸，而亞洲各國之民族，尤莫不與吾中華有血緣，其文明莫不以吾中華爲鼻祖。今欲以大亞細亞主義收拾亞洲之民族，捨新中華之覺醒、新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吾敢斷其絕無成功。（中略）必新中華民族主義確能發揚於東亞，而後大亞細亞主義始能光耀於世界。否則，幻想而已矣，夢囈而已矣。嗟乎！民族興亡，匹夫有責。歐美風雨，咄咄逼人。新中華民族之少年，慨雄飛躍進，以肩此大任也。（李大釗，1999a：494-495）

李大釗雖言不明日本所倡大亞細亞主義「指領何在」，然而文字間明顯表達出對大亞細亞主義意欲排除中國在亞洲之地位的憂慮，所以急喚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同樣的思維也出現在李大釗不久後發表的〈極東們羅主義〉，且看李大釗如何立說：

> 極東之形勢，則與兩美迥異。最近數十年來，所賴以維持平和之局者，乃在門户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今忽有一國焉，欲在亞東效們羅氏之宣言，是否與此門户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相背而馳？此等世界的大問題，是否可由一國乘歐戰方酣之日自由宣言，遂足定爲鐵案？（李大釗，1999a：500）

文中對日本掌控亞洲事務的主導權頗不以爲然。李大釗的敏銳，已經嗅出了日本意欲控制亞洲的野心，其後在〈大亞細亞主義〉（1917）與〈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1919）中，李大釗就相當露骨地揭露大亞細亞主義之帝國主義的本質。李大釗指出：「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而攘極東之霸權，禁他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洲人之掠奪而自爲掠奪，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結果必召白人之忌，終以嫁禍於全亞之同胞。則其唱大亞細亞主義，不獨不能維持亞細亞之大勢，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亞細亞人所宜出，此則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李大釗，1999a：663）此等論述可謂一語中的、鞭辟入裡。此外，李大釗更敏銳地指出大亞細亞主義的最大目標，便是對中國的侵略。他說：「第一，須知『大亞細亞主義』是併吞中國主義的隱語。（中略）表面是指是同文同種的親熱話，實際上卻有一種獨吞獨咽的意思在話裡包藏。第二，須知『大亞細亞主義』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亞細亞孟羅主義一句話，擋歐美人的駕，不令他們在東方擴張勢力。」（李大釗，1999b：146）文中的「擋歐美人的駕」、「獨吞獨咽」就已經將大亞細亞主義的侵略本質表露無遺。

於是，李大釗另行提倡主張亞洲各民族皆須獨立解放的「新亞細亞主義」與之對抗，並指出亞洲諸民族解放的最大障礙不在歐美，而在日本，實爲真知灼見。

肆、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二個高峰期與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提倡

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二個高峰期的出現，與 1924 年美國通過《排日移民法》有直接的關係。所謂的《排日移民法》，係指美國政府於 1924 年 7 月 1 日所施行的《1924 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排日移民法》是日本方面對此法案的俗稱，此移民法所排拒的外國人民亦非僅限日本人。對日本而言，這次《排日移民法》的精神，對日人進入美國的條件做了很大了限制，僅容許部份官憲、旅行者、商人、學生入國，其他如工人或永久的移民，更是完全杜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且命令不具美國公民資格的日人強制離境，這對日本移民造成了大恐慌，因而掀起喧然大波。（《台灣民報》，1924b：8）

其實，美日間的移民問題由來已久。原來美國在 1907 年頒布的《移民法》規定：赤道以南，東經四十度乃至一百二十度的廣大地區的人民，絕對不得入其國。亦即美國只承認歐美國家爲文明上國，其他諸如亞洲、非洲、南美洲，都被視爲蠻荒不文的地區。當年，日本主動與美國簽訂君子協定，保證對內約束日人的移民，以緩和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不過，美國的反日情緒仍不斷蔓延，同時，日本也對美國反日的舉止感到不滿。由於 1905 年日本戰勝俄國，自認東洋文明不下於西洋。其後與英國締結同盟，日本的國際地位藉以提升。隨著一次大戰的展開，日本秉持著日英同盟的關係爲英助戰，成爲一次大戰的戰勝國，日本甚至自認爲有實力列爲「世界三大強國」之列。（王敏川（譯），神田正雄（原著），1924：6）然而，1924 年美國頒布的《排日移民法》，依舊將日本國民拒於門外，遂讓日本與亞洲各國萬般受辱。因此，中國、印度等國的知識份子都起而聲援日本，即如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泰斯所言：

> 米國（案：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是表明西洋帝國主義的酷薄好戰主義，對這排日法案，不過是對全亞細亞人更一層大規模的計畫，所表出一部如加奈陀（案：加拿大）、南阿（案：南非）及濠洲（案：澳洲）的亞細亞人選舉權問題實例，和這有同一的結論，這樣手段，不外要阻害全亞細亞人發展的深謀遠慮，而生出的手段。他們想西洋是代表最高的文明，驅逐亞細亞人爲正當的權力，這種妄想的匡正策，反足以造亞細亞自由國民的聯盟，但是亞細亞的諸民族，若各甘於蟄伏於白人優越勢力下，想全亞細亞的苦悶，當必至繼續。（王敏川，2002：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民族自尊心受到貶抑的驅使之下，使得亞洲人民同仇敵愾地對抗歐美強權。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雖然日本民族的自尊心受辱，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大亞洲主義也在亞洲民族同仇敵愾的情緒中獲得了滋養、茁壯的契機。

美國的反日原因無他，這是因爲兩個強權在爭奪亞洲霸權的過程中針鋒相對所致。（桑兵，2009：278-280）相對於美國的反日風潮，日本境內也開始出現了反美風潮，其中又以抵制美貨運動最爲激烈。（《台灣民報》，1924c：4）在此兩大強權的針鋒相對之下，孫中山適時地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用以箝制兩大帝國強權的野心。孫中山認爲「大亞洲主義」是個文化問題，其中有兩項重點，其一，孫中山以東方的王道文化對比西方的霸道文化，他說道：「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愛，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個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我們是學來自衛的。（中略）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其二，孫中山希望日本行王道，而非霸道。孫中山呼籲日本國民：「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中略）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而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愼探。」（孫中山，1926：369-372）

孫中山很清楚「大亞洲主義」的成敗在於日本。對此，當時陪同孫中山赴日並擔任翻譯的戴季陶（1891～1949），便於日後論述中延伸了「大亞洲主義」的論旨。他認爲日本若不拋卻帝國主義，則東方民族的大同團結勢必無望，至於日本該如何拋卻帝國主義，其途徑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一是關於對華政策要援助中國國民的國家獨立運動，將治外法權撤廢和關稅獨立來勸告列強同時，日本率先宣示放棄《二十一條》，以示其範，由此對等之關係而築同盟之基礎。二是關於日本國內的問題，要拋棄歷來的殖民地統治方針，尊重朝鮮和台灣的民族自由，允許其召集人民議會和設立自治政府，並由著各民族的自由聯合以定統一的國家基礎。再則就是在南洋的日領諸島，也當許人民自治，盡量養成土人的政治智識，同時引導他們經濟的獨立，以示民族平等之範。三是火速和俄國無條件恢復邦交，協助德國擺脫列強共同之剝削以及任何阻礙德國復興之政策，藉此日俄德親善的契機，免除日本在國際上孤立的狀態。其中，又以第二項至關重要也最能展現日本的仁政，因爲「對內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的拋棄，旋爲對外的自由平等的國際的信義的基礎」，才能使東方各國「相信日本民族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東方諸民族的大團結，這纔能以日本爲中心而成立」。（戴季陶，1925：11）戴季陶的論述，不僅可視爲解釋了孫中山的本意，更可說體現了孫中山言猶未盡甚至難言之隱的意思。（桑兵，2009：294）

伍、「大亞洲主義」在台灣的興起

「大亞洲主義」要求日本帝國給予殖民地弱小民族獨立自由的地位，相當獲得台灣知識界的歡迎，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必須指出，「大亞洲主義」提出之時，正是由台灣文化協會所領導的民間的文化運動正熾之際，因此，構成了吸收「大亞洲主義」的理想環境。欲討論「大亞洲主義」如何被台灣社會所接受，必先理解台灣知識場域內部的變化。

一次大戰後，世界風潮丕變，民族自決的論調高唱入雲，中國五四運動所標舉的「民主」與「科學」之精神也給予台灣知識界很大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刺激，終於促成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在此之前，思考台灣民族之未來命運者，並不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林獻堂（1881～1956）。他曾於 1907 年與梁啓超（1873～1929）論及台灣的命運，梁啓超建議台灣尋求愛爾蘭爭取自治的模式，於是乎林獻堂便在 1914 年，參加板垣退助（1837～1919）所成立的「台灣同化會」，欲藉文化之名，爭取台灣民族的平等地位。然而在此時期，台灣知識界對於台灣民族的未來與命運，大多不甚關注。即如《警察沿革誌》所言：「進入大正七、八年間（1918～1919）時，亦即歐洲大戰的末期以後，歐洲的思想界顯然地爲昂揚的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想所風靡。隨而在所謂民族複合國家（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驟見民族自決思想的抬頭。（中略）這些風潮對遠東的台灣人、朝鮮人及其他各殖民地民族亦有極大影響，而成爲促使其民族覺醒的動機。（中略）從來這些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努力與日本的風俗習慣同化，對於社會問題，政治運動等並無深切的關心，雖被中國留學生或朝鮮學生指爲『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之愚民』而加以嘲笑，亦不敢抗辯。但由於智能的開發，遂使其對事物能夠有批判的看法。及至受到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以及伴隨而來的朝鮮萬歲騷動，支那革命的新展開等刺激，學生的思想傾向一變而主張『台灣非台灣人的台灣不可』。於是釀成了喚醒民族意識、集合團結提高台灣人地位，謀求自由和解放的運動趨勢。」（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a：18-19）因此，即便在 1918 年就已經是大亞洲主義論述的第一個高峰，不過台灣知識界卻未曾參與，也不見任何批評。

一、以「日華親善」爲幌子：白話文運動的推動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負起啓迪民智、文化向上的任務。此時台灣文化協會對於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仍然不置可否，不過，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批知識青年開始藉著「日華親善」的大旗爲幌子，推動起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而其仿效的對象，便是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經驗。對身處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知識青年而言，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無異於背叛日本國體的行爲。所謂的日本國體，是指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所有日本臣民皆爲天皇的赤子，成爲型塑日本人國家意識的「非宗教的宗教」（區建英、劉岳兵〔譯〕，丸山真男〔原著〕，2009：32）對於殖民地人民這種「新附民」而言，接受日本的國體更是必然的教育養成。那麼，台灣知識青年又何以能在違背日本國體的情況下，推動新文學運動？答案就在於「日華親善」這個符號的運用。

此一策略的運用首見於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一文。作爲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最早提倡者之一，陳端明大力鼓吹使用中國白話文來進行文學的改革，實爲開風氣之先，然而或許意識到中國白話文在台灣的移植會遭到台灣總督府的忌憚，陳端明解釋道：

> 論者或謂台灣歸日既久，漢文將歸無用，何杞憂乃爾？借問我台灣同胞之天命，豈非維持東亞平和之任乎？甚以東亞平和之任重且大，在日中之親善，介接觸之職者豈非台人乎？我敢言非台人不可？（陳端明，1979：5）

台灣早期推動新文學運動者，大都懷抱著祖國情結，欲同中國亦步亦趨，自不待言。然而這樣的論述與日本的國體相牴觸，勢必危及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因此陳端明便以「日華親善」爲旗幟，用以強化推動新文學運動的合法性，也試圖合理化台灣知識份子學習五四經驗的行爲。

雖然陳端明試圖使台灣新文學運動獲得合法性，不過他的一己之言仍不足以使之合法化。在此困境中，令台灣知識份子振奮的消息於隔年傳來。1923 年 3 月 23 日，日本國會終於通過了延宕多年的《漢學振興案》。此案過去多次受阻，直到鎌田榮吉（前慶應大學校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擔任內閣文相後，開始主張保持東洋的古典文化，故對本案表示贊成。此案通過之後，意味著日本不再盲從於西洋的文化，而欲進行保存東洋固有文化的運動。（《台灣民報》，1923a：13）這也使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契機。

趁此振興漢學的風潮，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也跨入了另一道里程碑，那便是 1923 年《台灣民報》的創刊。《台灣民報》是以推動白話文運動爲目標而創刊，誌面所刊載之文章亦悉數以中國白話文所作，似乎有著 Anderson 所謂的以「印刷資本主義」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的企圖，（吳叡人〔譯〕，Anderson〔原著〕， 2003）不過，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並非台灣民族自身，而是對中國的認同。爲了掩飾這份中國認同，《台灣民報》照例揭起了「日華親善」這個「政治正確」的符號，其〈創刊詞〉如此聲明其宗旨「不外欲啓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台灣的幸福，求東洋的和平而已」。（林呈祿，1923：1）此處所言之「東洋的和平」，在當時乃是「日華親善」與「日華共存共榮」的同義詞，都在標榜日華合作的必要性，由此可見「日華親善」再次成爲台灣知識份子明哲保身的策略。

《台灣民報》以「日華親善」爲名而推動白話文運動的例子，還不僅如此而已。《台灣民報》更創設了「白話文研究會」，不但專研白話文的創作，更以到台灣各地開設講習會爲其職務。這樣的「白話文研究會」，便推出了日本國會通過了《漢學振興案》作爲說詞，直言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性，「欲保持東洋的文化，實行日華的親善。日本本國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同胞倒返不知不覺，你道可愧不可愧呢？」（《台灣民報》，1923b：29）在此「政治正確」的氣氛之下，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也對白話文運動的推動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一度被台人視爲有史以來最好的總督。（超今，1923：11）

雖然田健治郎總督對漢文的保存持開放的態度，不過台灣總督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際上卻未對漢文實行鼓勵政策，反而有打壓阻抑之舉，爲此，《台灣民報》再次於〈社論〉中大鳴大放，要求獎勵漢文的普及，並提出三點理由：第一，台人有維持東亞平和的使命，實行日華親善的媒介，若沒有理解漢文，是必不能聯絡彼此的感情。第二，台人此後當圖發展於中國南洋呂宋等處，不可捨棄漢文而不學。第三，於日常生活皆不可缺，若不識漢文，是和啞盲感一樣的苦痛。（王敏川，1924b：1）可見，在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論述下，台人也從中找到了其矛盾性，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以建構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合法性，使得新文學運動得以順利展開。

二、對「大亞洲主義」的唱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推動及自治權的爭取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要求日本放棄帝國主義，戴季陶在詮釋「大亞洲主義」時更點名日本必須恢復朝鮮與台灣等殖民地民族之自由，此一論調無疑大受台人的歡迎，因此在台出現了與「大亞洲主義」相唱和的現象。

其實在 1924 年 4 月美國議會擬提案《排日移民法》之際，台人不僅關注日本政府處理的態度，同時也相當關心孫中山對此事的看法。初時孫中山面對此問題，給予了「余憾不得立意見之語」的答覆，明顯迴避了這個問題。台人對孫中山的態度不明，也不置可否。不久，孫中山確立了立場，直言：「白色人種的橫暴，今更不要再論，而日本奮起爲亞細亞民族團結，圖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來的願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歐米之後塵，不但不留意於亞細亞民族的團結問題，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這回受了米國的排日，想就有得著相當的教訓，聽說輿論沸騰，各種的運動繼起，但是這回日本總也沒有出最後手段的勇氣，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於亞細亞民族的大同團結，依賴其勢力之外，再沒有法子了。」（《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民報》，1924a：7）孫中山的說法，獲得了台人的贊同與唱和，因而在報刊上大聲疾呼日本放棄帝國主義，並接著指出：「（日本）如有心於東亞的團結，須要對中國的問題，朝鮮台灣的問題，先解決妥當才成了。」（《台灣民報》，1924a：8）可見，台人在孫中山論述中看見了台人地位提升的曙光，開始與之唱和。

必須知道，此時台人對自身地位提升的呼求，並不在於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在於諸如自治權等權益的提升，其實際作爲便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而被論者視爲「缺乏主權欲求」的行爲（游勝冠，2000：57、91、103-106）。「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日治時期台灣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始於 1921 年，終於 1934 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設置台灣住民選舉的台灣議會，以便協助台灣的特別立法與預算審核，也就是法律委任台灣總督的特別立法權，改由台灣議會審查，以箝制因《六三法》而將行政權與立法權獨攬於一身的台灣總督政治。「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初時只向數名同情台人遭遇的日本議員尋求合作，然效果有限。到了 1924 年日本因《排日移民法》的通過而感到受辱之後，台人也藉機宣揚改善台人地位的論述。

5 月 28 日，被稱爲「台灣人唯一喉舌」的《台灣民報》，以社說〈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一文，表達了其立場。文章一開始指責美國的種族主義的橫暴，致使整個亞洲民族全體受辱，這不只是日本該面對的問題，更是全亞洲都該面對的問題。然而走筆至此話鋒一轉，開始檢討日本的帝國主義。

> 日本既自許爲亞細亞的盟主，何以緘口受辱？爲日本自國利害關係計，爲同族的解放，日本亦宜奮起毅力以圖亞細亞民族的大同團結。我們認定美國通過排日法案，正是我們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又是日本實現亞細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的盟主之絕好機會。但是日本要完成這樣大使命、大目的，不可無相當的覺悟。甚麼覺悟呢？一要厚待亞細亞弱小的民族，這回他們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可不是日本從來有令人不滿的地方嗎？二則要求他人解放，宜先自解放他人。譬如對朝鮮台灣的人，應該解放與母國人同等的待遇，享同等的幸福。倘日本果有實踐躬行的雅量，亞細亞的民族，就不難於團結了。所以我們希望日本對於美國這回的排日法案，應取積極的態度。又利用這個問題以爲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一舟，1924：1）

這篇「社說」的內容，可見堅定且明白地主張弱小民族的平等待遇。對台人而言，亞細亞民族的大同團結是個理想目標，台人最關心的還是自身民族地位的提升。不過，孫中山的立言以及台人的深切呼籲並沒有獲得日本政府的正面回應。

6 月 11 日，憲政會在眾議院總選舉中獲得勝利，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任總理大臣，取代既有的特權藩閥政治，實現了政黨政治。台人對加藤內閣的新氣象與新思維有所期待，《台灣民報》再次於社說〈台人重大的使命〉中發表論說，強調台人的地位與日華親善的關聯性。文中再次針對《排日移民法》的風波表達意見：「我們黃人種若思對於白人種要求平等待遇，當先要於黃人間撤去差別，才免使白人有所藉口」，並呼籲日本政府做到兩項具體作爲，其一須慎重於朝鮮台灣的待遇，其次圖日華新善，以此才得以保東洋之和平。在中日兩國間，台人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因此促進東洋的和平正是台人的使命。不過，此時話鋒一轉，指出台人欲實行其使命，其地位必先改善，社說中提出三點建議：第一，須設置民意暢達的立法機關。第二，須實行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第三，須要打破文化上的陋習，助台人臻於文明之域。（王敏川，1924b：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述台灣新文學運動推行之初，便以「日華親善」作爲「政治正確」的符號，到了《排日移民法》通過之後，「日華親善」以及孫中山所謂的「（日本）如有心於東亞的團結，須要對中國的問題，朝鮮台灣的問題，先解決妥當才成了」的論點，又再次成爲台人爭取民族地位提升的自保之道，最明顯的例子便是 1924 年所展開的對「治警事件」（《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的審判。「治警事件」發生於 1923 年 12 月，原因在於蔣渭水（1891～1931）、蔡培火（1889～1983）等人爲了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成立了「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卻被總督府以非法結社違反《治安警察法》爲由逮捕，此即「治警事件」。1924 年 8 月 1 日的「治警事件」審判庭，便可看出台人對於孫中山論述的運用。庭中，三好一八檢察官怒斥十七名被告：「不喜和日本同化，就不是日本的優良國民，既不喜同化政策，此際宜離去台灣。」一下子就對蔣渭水、蔡培火等被告扣上了「非國民」的大帽子（《台灣民報》，1924b：3）。對此，被告之一的林呈祿（1886～1968）反駁說，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已表達弱小民族的「民族自決」的立場，日本亦應革新過去的殖民政策。另一名被告陳逢源（1893～1982）說的更是振振有詞，他指出同化主義並非殖民統治的良策，日本應有另一種思維才是。

> 我現在想要換同化主義改做眞基礎於共存共榮主義的友聯主義，即是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以我所想若要解決台灣問題，除非由這友聯主義不可，以這條路行不但爲解決殖民政策的方針有所裨益，對於東亞民族的聯盟或是日本國家的繁榮大大有所關連。日本對於米國而唱人道主義，對朝鮮滿洲而實行帝國主義是吾人所不能了解。爲此受他民族種種誤解，確實害了日本的威信。（《台灣民報》，1924e：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逢源所提出的「友聯主義」，是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中最早且可能是唯一明白以聯邦主義（federalism）架構來解決日本這個多民族國家（muiti-national state）內的權力分配問題的主張（吳叡人，2001：70）。陳逢源的「友聯主義」論述始於 1923 年，此時的發言雖然貌似當年論點的再度表述，不過文辭間卻可見其新意。陳逢源於 1923 年提出「友聯主義」時，只放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分配的討論框架之中，也就是地方向中央「分權」的立場（陳逢源，1923a、1923b）。然而在 1924 年的「治警事件」審判庭中，陳逢源更加入了「東亞民族的聯盟」的思考，也就是說，此時的「友聯主義」不僅僅在探討日本境內的問題，而是放在東亞民族聯邦的框架之中進行思考，可見此時的「友聯主義」受到孫中山的亞細亞民族同盟論述的影響，已有了不同的視野與格局。「治警事件」可見日本欲以強勢同化主義實行殖民政策，然陳逢源卻以當時最爲盛行的亞細亞民族同盟論述，作爲反駁殖民當局的利器，他直言日本殖民政策的失當，將會造成亞洲各民族的疑慮，使得亞細亞民族同盟宣告瓦解。這些修辭明顯帶有「政治正確」的意味，也使陳逢源的發言格外義正嚴詞、有恃無恐。這次的一審判決或許因爲陳逢源等人立論得當，竟獲判無罪。然而，三好一八檢察官再提上訴，蔣渭水等人最終被判有罪。雖然如此，從「治警事件」的審判庭的答辯中亦可看出，孫中山論述對台人的影響甚深。

雖然外有孫中山的倡言亞細亞民族同盟的重要性，內有台人立言呼應台灣議會設置的必要性，卻似乎沒有功效。因此，《台灣民報》接著試圖藉由引述日本、中國與印度的相關輿論，以製造對台灣有利的氛圍，因此對於相關意見的翻譯也就因運而生。日本的輿論方面，相關的翻譯狀況如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台灣民報》引述島外唱和「大亞洲主義」相關意見一覽表

作　　者	譯　　者	篇　　名	日　　期	卷　　號	來源刊物
石崎東國	王敏川（錫舟）	人種問題和亞細亞文化聯盟	1924.6.21	2 卷 11 號	
アールビーボース氏		東洋人聯盟的目標	1924.6.21	2 卷 11 號	改造
千葉氏		日本對同色民族要悔悟了	1924.6.21	2 卷 11 號	
社論		高唱對華親善	1924.7.1	2 卷 12 號	東京朝日新聞
	王敏川（錫舟）	由酣睡中大亞細亞的覺醒和白人侵略的抗拒	1924.7.1	2 卷 12 號	日本及日本人
神田正雄	王敏川（錫舟）	排日法和全亞細亞問題	1924.9.11	2 卷 17 號	
米田實	蔣渭水	東洋諸民族的覺醒	1924.10.11	2 卷 20 號	
社說	王敏川（錫舟）	時論拔萃－新領土統治宜考其根本	1924.10.21	2 卷 21 號	大阪每日新聞
	王敏川（錫舟）	就台灣的統治希望伊澤新總督	1924.12.21	2 卷 25 號	殖民雜誌
社說	王敏川（錫舟）	亞細亞民族的團結	1925.1.1	3 卷 1 號	大阪每日新聞
社說	王敏川（錫舟）	對孫文的希望	1925.1.1	3 卷 1 號	大阪朝日新聞
社說	王敏川（錫舟）	治外法權的撤廢－中國國民的要求	1925.1.11	3 卷 2 號	大阪每日新聞
社說	王敏川（錫舟）	日米的將來	1925.1.21	3 卷 3 號	報知新聞
神田正雄等	王敏川（錫舟）	關於朝鮮台灣地方自治制施行之建議案理由書	1925.3.21	3 卷 9 號	

資料來源：根據《台灣民報》誌面刊載文章所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又以石崎東國〈人種問題和亞細亞文化聯盟〉、神田正雄〈排日法和全亞細亞問題〉與米田實〈東洋諸民族的覺醒〉等三文最具代表性。石崎東國認爲《排日移民法》是促使亞洲各民族文化同盟的契機，日本必須負起使命，亞洲才能自救，追求全亞洲共同的利益。神田正雄（王敏川〔譯〕，神田正雄〔原著〕，1924）則在文中提出三個想法：一、排日法是日華提攜的促進，二、「二十一條要求」問題的解決，三、宜尊重台灣朝鮮的民意。前兩個想法都在表達日華提攜的必要性以其實踐之道，第三個想法則在呼籲日本放棄支配者、征服者的優越感，莫以己作本位而欲同化台灣、朝鮮等弱小民族。如此對美國的蠻橫才能堂堂正正地反擊。這樣的想法十分受到台人歡迎。至於米田實〈東洋諸民族的覺醒〉，則是認爲一次大戰以來亞洲諸民族的相繼覺醒已成爲一大趨勢，文中以土耳其、埃及、阿富汗、波斯、印度等五國的覺醒爲例，說明亞洲民族覺醒的必然性以及亞洲未來的前途看好。蔣渭水翻譯此文，當然也隱含著台灣必須趁此風潮圖謀覺醒與解放的用意。

中國的輿論方面，《台灣民報》曾引述《民國日報》的論點，對於美國基於人種的偏見禁止日本移民，表示同情，不過日本若只是爲了自衛的目的，而非爲了打破美國根本之偏見，則令人無法贊同。（《台灣民報》，1924d：13）換言之，中國輿論亦希望日本有更積極的作爲，而非只求自保。其後，《台灣民報》更引述中國國民黨〈致日本國民之忠告書〉，文中認爲日本所謂的日華親善全無誠意，對於在日華工的暴力取締正是一例，今日受到美國禁止移民，日本朝野大怒，然而已所不欲何施於人，希望日本國民能一致鞭韃政府以行正道。（《台灣民報》，1924g：2）亦即日本欲求大亞細亞主義的推動，必先求日華親善的落實。

印度的輿論方面，最著名的便是印度獨立運動的巨頭施阿爾泰斯表示，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是西洋帝國主義好戰主義之表現。歐美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代表最高的文明，驅逐亞洲人是正當的權利。此外，白人的手段是要阻害亞細亞人之發展的陰險手段，使全亞細亞人則不得不繼續承受被壓迫的痛苦，陀斯指摘這是基督教文明的墮落。爲此，亞洲必當建設亞細亞民族同盟，以復興亞洲文化，以及保障各民族的生存。（《台灣民報》，1924e：13）另外，蝦斯篤里演講道，「美國之排斥東洋移民，實侮辱全世界人類之半數，而此半數人類，對於世界之文明，有絕大的貢獻。……吾人非欲盡除歐美文明，實欲改良歐美文明。亞細亞固有之文明，歐美苟不學習中國日本印度之文明，恐亦無以生存。……余望中日兩國擯棄小問題，同歸於好，印度亦以其特長貢獻於亞洲，做精神的提攜，使英美人之所覺悟。」（《台灣民報》，1924i：9）都在期待亞洲文化的復興，以及亞細亞民族同盟的建設。

然而，這曇花一現的輿論並沒有改變日本殖民政策的方針，台人企圖運用亞細亞民族聯盟與弱小民族自決的論述，以提升台人民族地位的策略，也未能獲得日本政府與殖民當局的正面回應，因此，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合法化並沒有獲得認可。

三、「大亞洲主義」與蔣渭水的民族解放路線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缺乏主權欲求，雖言民族解放，卻只著重於自治權的爭取。然而到了 1927 年後，台灣的政治運動開始有了新的格局。一是由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民眾黨所代表的右翼民族解放路線，一是由台共所代表的左翼民族解放路線。

「大亞洲主義」曾在 1924、1925 年間在台灣喧騰一時，不過隨著孫中山在 1925 年辭世，此論述無以爲繼。不過到了 1927 年「大亞洲主義」與亞細亞民族同盟的構想在蔣渭水領導台灣民眾黨之後成爲右翼民族解放運動的路線，此時的「大亞洲主義」才超脫了爭取自治權的格局，成爲民族解放的藍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蔣渭水信仰孫文主義，受中國革命經驗影響甚深，這樣的評價在日治時期的官方資料《警察沿革誌》便可窺見，（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a：185）當今學界在討論蔣渭水的思想縱深時亦承此說，蔣渭水因而有了「台灣的孫中山」之稱。（黃煌雄，2006）論者吳叡人亦曾分析 1927 年以後台灣民族解放論述的生成，認爲以蔣渭水爲代表右翼民族解放論述有六個原則：第一，以「民族解放」吸納「階級鬥爭」；第二，政治運動優先；第三，以工農階級作爲民族解放運動之基礎；第四，反對階級鬥爭與共產主義，主張階級合作與利益調和；第五，黨作爲多階級之民族解放統一戰線之領導機關；第六，台灣民族運動作爲非共產主義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反帝運動的一環，其路線更是承襲自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非共的國際解放陣線」的藍圖。（吳叡人，2001）其中這第六點便是本文所要探討之處。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此時「大亞洲主義」在蔣渭水的論述下已不以日華親善爲唯一號召，而是以亞細亞民族同盟作爲其最高理想。前述蔣渭水譯〈東洋諸民族的覺醒〉，其意旨便在於催化台灣民族的覺醒與解放，及至 1927 年台灣民眾黨成立之後，蔣渭水更是以孫文主義作爲黨綱的理論基礎，其中，「大亞洲主義」便成爲台灣民眾黨的解放理論。在 1927 年創黨之初，蔣渭水〈我的主張〉中表示，白人優越感是造成世界失和的主因，爲打破其優越感，唯一的手段便是大亞細亞聯盟，而大亞細亞聯盟的前提即日華親善。至於台灣民眾黨的責任，則在於「提高台灣人的生活，使它達成與內地人（日本人）平等的地位，以完成日華親善的媒介者——台灣人的歷史使命。」（蔣渭水，2005：130）蔣渭水的發言，顯然承襲了 1924、1925 年間台灣知識份子的共同訴求，他將此訴求轉化成爲台灣民眾黨的路線，並試圖加以實踐。

必須知道，蔣渭水的思想並非固著不變的。從 1927 年台灣民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黨創黨到 1931 年蔣渭水辭世的這四年間，蔣渭水的思想可謂漸次地向左傾之道邁進。從〈我的主張〉的內容觀之，足見蔣渭水的主張採取穩健路線，未有民族獨立等激烈言詞出現。然而自 1928 年起，蔣渭水的台灣民族解放論述也就越來越明目張膽。首先是在 1928 年 7 月的〈台灣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宣告草案〉，蔣渭水如是寫道：

> 俄國民眾之革命、德國勞動者之暴動、英國勞動者之總同盟罷工及日本無產政黨之出現等，莫不是無產階級抬頭之現象。其他如埃及脫離英國之控制、土耳其之獨立、印度之自治運動、中國之國民革命等，都是弱小民族崛起的現象。兩者之解放運動時為現代新興之兩大勢力。而這兩者都站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被壓迫地位。因而務必同病相憐，以打倒帝國主義公敵為共同目標，採取聯合陣線，一致進攻。……在此，我們欲求台灣人之解放，對內先要喚起全台灣人之總動員，對外與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連繫，共同奮鬥，始能達其目的。（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a：176-177）

此外，1929 年 10 月，蔣渭水在〈台灣民眾黨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中，變本加厲地指出：

> 我們統觀世界、日本及台灣的情勢，知道帝國主義國間和帝國主義國內的矛盾日漸擴大和尖銳化，其基礎已頻動搖，其崩壞之日必不在遠，而世界上一切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眾之互相聯合，共同鬥爭，實為其致命之傷。然而因為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眾結合不堅固，連絡不緊密，反使他們加倍反動而逞其暴威，故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眾，今後亦當對內堅固其陣營，對外緊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其連絡，努力奮鬥猛烈進攻，以期和他們作最後之決鬥，這是很切要的事。……外須連絡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眾，參加國際的解放戰線，以其匯合於世界解放之潮流。（蔣渭水，2005：261-262）

蔣渭水的論述顯然亦乞靈於孫中山亞細亞民族同盟論述。然而，不同於前一期之台人只從中獲得爭取自治權的理論資源，蔣渭水從中攫取的是台灣民族獨立解放、與其他弱小民族共組聯盟的藍圖。孫中山所構思的國際解放陣線，是以弱小民族聯合反帝理論爲核心，一面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聯盟，一面區隔於列寧的共產國際，戴季陶稱此解放陣線爲「民族國際」（Nations International）。（李玉貞，1996：489）而蔣渭水主導下的台灣民眾黨的「國際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解放陣線」，雖然明顯有列寧主義色彩，但從蔣反對共產國際霸權，堅持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自主性立場觀之，無疑是孫中山反帝反共的「民族國際」路線。（吳叡人，2001：90）當然，這種「大逆不道」的思想被殖民當局以「內容多涉偏激」之故下令禁止，可見殖民當局對此論述之忌憚。（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a：17）

1930 年以後，蔣渭水的左傾更加明顯。筆者近來的研究發現，到了 1930 年，蔣渭水受到了 1928 年共產國際提出「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的啓發，以及 1929 年世界性經濟大恐慌的刺激，蔣渭水放棄了他過去認爲資本主義尚處於「安定期」的主張，轉而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致力於推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 1930 年之後，心儀蘇聯新經濟政策的蔣渭水、認爲孫文主義具有發展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可能性的蔣渭水、決定放棄合法改良主義路線而欲與台共・新文協合流的蔣渭水，似已不再反對階級鬥爭，而且其死前遺言：「台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已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極力奮鬥，舊同志倍加團結，積極協助青年同志，盼望爲解放同胞而努力。」也可視爲對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的高度肯定。（趙勳達，2010）在蔣渭水接受了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甚至說出此時正處於「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轉換時期」之際，筆者以爲蔣渭水的民族解放路線亦產生了質變，那便是響應了共產國際的號召，這是可以肯定的。此外，蔣渭水此時所構想的民族解放藍圖，似乎傾向於共產國際的革命路線，至於蔣渭水是否完全放棄孫中山的「民族國際」的解放路線，目前無法證實，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孫文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所勾勒的解放藍圖，已非蔣渭水唯一的政治信仰。

陸、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三個高峰期與「大亞洲主義」的沒落

進入了 1930 年代，日本軍方對外擴張的意圖越發明顯，因此再度帶動大亞細亞主義的風行。與此相較，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所帶有的牽制力便弱化不了，台人雖然依舊援引「大亞洲主義」的意涵謀求台灣民族的平等地位，然而卻也日見事不可爲的趨勢。以下本文將就 1930 年代台灣社會所出現的空前盛行的大亞細亞主義風潮，以及台人如何竭力運用大亞細亞主義的論述矛盾以轉化爲對台人有利的論述，作一說明。

一、日本退出「國際聯盟」與大亞細亞主義的第三個高峰期

1927 年台灣民眾黨創黨之初，黨內就包含著自治主義（如蔡培火、彭華英）與解放運動（如蔣渭水）兩條路線，隨著蔣渭水的勢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漸大，蔡培火一派也就相對弱勢，最後相繼離開。1928 年 6 月原擔任民眾黨主幹的彭華英（1893～1968）離職，首度使民眾黨的內鬨表面化。不認同蔣渭水路線的彭華英，遂有了新的政治選擇。有鑑於台灣當時在台灣民眾黨與台灣文化協會等活動下徒然唆使台人對日本的反抗心，1929 年 9 月原本在南中國活動的台人謝龍闊返台，與彭華英、楊承基（《台南新報》記者）共同商議增進台人幸福之道。爲了排除民眾黨與文協的影響與掣肘，以謀求內台的融合，促其增進亞細亞民族的大同團結，遂有了政治結社的打算，最後輾轉定名爲「大同促進會」。然而，「大同促進會」真正的成立直到了隔年 8 月才完成，成立初期聲勢浩大，聲稱台北區有 12 個支部，1200 名會員。

如今我們看大同促進會在成立前所發表的〈大同促進會宣言〉，便可以理解此團體的政治傾向：「爲實現大同理想，我們終於站起來了。奮鬥吧！同志們！希望去除邪僻心，爲要刷除優越感，胸懷切不可狹窄。共存共榮焉非人類生活之目的？請速治好神經過敏症，且勿越發加深保持特權的執著心吧。改正談論小道理的毛病吧。捨棄污穢的感情吧！宜去掉民族偏見、認眞討論我們社會共同生活的大根本不可。這就是我們在這裡舉起大同無我的大旗向天下呼籲的所以然。」這種標榜「共存共榮」、「大同團結」的論調，表面上似乎是受到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影響下的產物，然卻非如此。文中又寫道：「仔細觀察台灣的現狀，輕挑浮華之風瀰漫而質樸剛健之美完全掃地。……民心的勃發在於啓發，在於鞭撻。又緣由於扶掖。這是爲政者的責任，同時亦有待於民眾本身的奮起。維持善政是國民的義務，同時又是權利，而愛護民眾又是保持國家尊嚴的所以然。善導人心是爲政者之德，又因國民各自的自制心有以致之。自暴自棄者，其愚亦甚，而其害將波及他人。不可不慮之。以右手爲穢而捨之，又以左手爲不便而斷之則奈何？宜互相隱忍自重而擔當其事。」（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局〔原著〕，2006b：38-41）文中以隱喻的方式暗批台灣右翼（台灣民眾黨）與左翼（台灣文化協會）的相互攻訐以及對抗殖民政權，實爲「自暴自棄者，其愚亦甚，而其害將波及他人」，對於這兩條代表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路線，「大同促進會」給予了如此不堪的評價，足見其向殖民當局靠攏的政治傾向，也使得其所宣稱之「共存共榮」、「大同團結」，成爲爲日本帝國主義／大亞細亞主義服務的論調。

1933 年，台灣社會大興大亞細亞主義之風，大同促進會於該年 10 月亦修改會則，其中明訂「本會對台灣統治，支持及強調內地延長主義，對外首先促進確立亞細亞聯盟，另一面以經營社會事業及社會教化爲目的。」此外，在〈大同促進會非常時期宣言〉中亦云：「站在台灣同胞的立場，吾人肯定內地延長主義，所以進一步策勵具體的方法，要求眞正的內地延長政策之實現。站在亞洲民族的立場，吾人肯定大亞細亞主義，是故同時又致力促其眞正的亞洲聯盟之確立。」（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a：41-48）這兩份資料都表達出同一個訊息：大同促進會對其政治主張已不再隱晦其詞，而是開門見山地大倡服膺日本官方政策的同化主義。

必須說明的是，此處所言之「非常時期」有其時代背景。1931 年日本發動「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旋即佔領中國東北，並迎溥儀成立滿洲國政權，號稱謀求弱小民族（滿族）的獨立。不過，滿洲國的合法性並不爲「國際聯盟」所承認，隔年，「國際聯盟」派來調查專使，其調查報告十分不利於日本，1933 年 3 月日本遂憤而退出「國際聯盟」，並指稱歐美列強欲行「亞洲門戶解放主義」，干預亞洲事務，一時大亞細亞主義再興。換言之，大同促進會在 1933 年 10 月對〈會則〉的修定與〈大同促進會非常時期宣言〉的頒布，實際上就是一種宣示效忠日本帝國與殖民政權的行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尤有甚者，是大同促進會對軍權的效忠。原來在 1924 年由加藤內閣所建立的政黨政治，到了 1932 年法西斯軍人發動政變，推翻犬養內閣，政黨政治時代至此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軍國主義的鼎盛。同樣在 1933 年 10 月，大同促進會對台灣軍司令部上陳〈對軍司令官的致敬書〉，文中有言：「如斯東亞瀕危之秋，能夠拯救其命運的，捨東亞的盟主我帝國之外，還有誰可以勝任？是的，這是眾所公認而加以期許的。際此危機，我帝國應以軍臨於世的皇道精神，喚起已成爲白種人笑柄的支那的王道精神，藉以互相攜手合作，成爲建立大亞細亞聯盟的先覺方針，吾人深切痛感如此。相信這就是期盼人類永久福祉的一大理想及現實無疑。」（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b：49）文中透露出一道很重要的訊息，孫中山提倡「大亞洲主義」時，呼籲日本棄西方的霸道（帝國主義），行亞洲的王道（仁義），然而時至此時，大同促進會卻要求台灣軍司令官大行霸道（皇道），而王道精神已淪爲等而下之的地位。

與此同時，1933 年 3 月東京成立了「大亞細亞協會」，隔年 1 月台灣也成立了「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在〈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設立主旨書〉中，可以見到將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暴行加以合理化的論述。

> 就日本和亞洲聯盟之間的立場問題，特別在此際有稍加述及的必要。一面維護著亞洲的權益，一面可以用實力對抗歐美勢力的國家，亞洲雖大但唯有日本一國而已。這不是日本國民的自負，而是事實俱在的。而且只要身爲亞洲各民族，如果仔細檢討過去日本所採取的對華政策的話，那麼可以很明顯的察覺出，事實上日本始終一貫執著於維護亞洲的國策，這是有跡可循的。日清戰爭雖有些許的例外，但日俄戰爭是明顯地爲了支那，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爲了全亞洲防衛並排擊歐洲勢力的侵入遠東。在世界大戰時，則奪取了德國在支那的根據地將之原物奉還了支那。而帝國海軍則爲了以太平洋爲其前院的亞洲大陸擔當防衛之任。去年，日本以非常的決心脫離國際聯盟的原因，也是由於國際聯盟無視於亞東的實情，想蠻橫不講理的橫加干涉之緣故。這一行動便是歐美對遠東事情認識不清，欲將共同的壓迫強加日本，我國終於毅然決然地起而加以排除而無他。防衛亞洲的非爲亞洲民族本身不可。然而在亞洲內部由於兄弟鬩牆，一方爲了強壓對方而引進歐美勢力，這種無自覺的政策終於導致了如滿洲事變一類不幸事情的發生。我們認爲滿洲事變是把歐美勢力引用於亞洲的錯誤政策的必然結果。（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b：52-53）

此文對滿洲事變的陳述，通篇不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省，而是怪罪歐美勢力的入侵，以及批判中國欲借歐美勢力箝制日本的錯誤政策。可以想見，此時日本已將「暴行」美化爲「義舉」，趁機大倡大亞細亞主義，而台灣，則也涉入了此一風潮之中。據台灣總督府的官方資料《警察沿革誌》指出，「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的成員並非皆爲親日人士，其中亦不乏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者，這是相當值得注目的現象。（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b：50）然而，這種陳述可謂統治者觀點的投射，試圖營造台人服膺大亞細亞主義的假象。正如蔡培火曾在日記中寫道，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專以所謂御用紳士者流立爲幹部」，（蔡培火，2000：283）就可以明白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乃爲親日人士所把持。

二、「大亞洲主義」的逆境求生

當時，台灣社會的大亞細亞主義之風空前蓬勃，除了上述兩個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之外，1930 年代的台灣社會亦先後出現「東亞共榮協會」（台中）、「大亞洲黎明協會」（台北）與「興亞協會」（基隆）等「主張」大亞細亞主義的民間組織，然其立場與策略便與大同促進會及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大相逕庭。據《警察沿革誌》指出，上述三個團體都大力支持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共榮協會」由 1920 年代新文化運動的要員陳炘與日人宮原武熊發起，委員有葉榮鐘、張煥珪、張聘三等人，更以林獻堂爲顧問，可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多有涉入。「大亞洲黎明協會」的成員則以黃白成枝、陳總、曾德志、張晴川、陳春金等人爲主，這些人員原爲左翼人士，不過受到「大亞細亞協會」的刺戟，轉而「主張」大亞細亞主義。「興亞協會」的成員楊元丁、藍南山、楊阿壽、李天章等人，亦曾分別參與左翼運動，此時亦已轉向大亞細亞主義。（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b：57-67）

然而實際情況恐非如此。以「東亞共榮協會」與「大亞洲黎明協會」爲例，他們的訴求「立腳於大亞細亞主義，策進內台融合，意志團結，共同謀求日支親善及東洋和平的確立，以期亞洲民族的生存權和文化發展」，表面上服膺大亞細亞主義，實際上則是在大亞細亞論述中尋求矛盾，藉以宣傳「內台融合」的理念，以提高台人的地位。證據就在《林獻堂日記》中。據《林獻堂日記》記載，蔡培火曾於 1934 年 1 月趁「大亞細亞協會」東京本部來台宣傳大亞細亞主義之際，與其交談，並詰問「內台不能融和何能日華親善？」卻未獲得對方正面回應。（林獻堂，2000：17）由此可見蔡培火與林獻堂等政治運動的要角，皆欲以大亞細亞主義爲幌子，以全內台融合之實。然而，這種策略卻只獲得「大亞細亞協會」東京本部虛以委蛇的態度。

不僅如此，林獻堂等人亦將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施之於當時台灣總督中川健藏。1934 年 1 月 12 日，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三人同訪中川總督，談及大亞細亞協會與東亞共榮會。中川總督即言：「台灣人必定先自認爲日本人方可言及東亞，不然捨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逐末實爲不可。」（林獻堂，2000：20）林獻堂向來主張「平等論」、反對「同化論」，他所主導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並非誠心服膺官方意識型態，而是以改善台灣民族的地位作出發點。從這一席話，可見中川總督已察覺林獻堂等人的策略，認爲台人並非真心服膺於大亞細亞主義。由此亦可推測，台人企圖藉由大亞細亞主義的論述，實現「內台融合」等提升台人地位的策略，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

雖然如此，卻可以看到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逆境求生。誠然，林獻堂等人不似蔣渭水那般激進，「大亞洲主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深切勸戒，已不復見於此時台人論述之中。然而，「大亞洲主義」此時依舊扮演著突顯大亞細亞主義的論述矛盾的角色，台人利用此論述矛盾，強化了「內台融合」與台人地位提升的必要性，這可以說是 1924 年宣揚「大亞洲主義」以來不變的策略。由此可見，大亞細亞主義推動了日本帝國掌握亞洲霸權的野心，卻也同時激發了台人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的渴望。

柒、結論

作爲日本帝國主義論述的大亞細亞主義，曾在一戰期間、1924 年《排日移民法》通過以及 1933 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等三個時間點，有過三次的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期台人來不及參與，不過到了第二、第三個高峰期，就可以看到台人與大亞細亞主義對話、甚至對抗的歷史痕跡。

1924 年因《排日移民法》通過，孫中山順勢提出了「大亞洲主義」，卻藉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應行王道，而非霸道，已成全亞洲民族的團結。受此論述的刺激，日本、中國與印度等地的輿論亦相繼出現了相似的看法，台人也藉此挪用了「大亞洲主義」的解放弱小民族與亞洲民族融合的觀點，並利用了大亞細亞主義的論述矛盾，企圖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台灣民族的平等地位請命，不過結果未盡人意。1927 年起，蔣渭水利用「大亞洲主義」的論述作爲台灣民族解放的理論基礎，企圖規畫台灣民族脫離日本統治的藍圖。這是台人對「大亞洲主義」最激進的詮釋與實踐，然而隨著蔣渭水轉向共產國際路線及其不久後的病逝，此一激進路線亦無以爲繼。

1930 年代台灣的大亞細亞主義之風空前蓬勃，成立了若干鼓吹大亞細亞主義的民間團體，這些團體可分爲兩類，其一是認同日本帝國對外擴張的立場，以大同促進會與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爲代表。和這種親日立場相異的是第二種觀點，此觀點再次以大亞細亞主義本身的論述矛盾，藉以宣揚「內台融合」，以擺脫台人的附庸地位，以東亞共榮協會、大亞洲黎明協會、興亞協會爲代表。此派以林獻堂最爲知名，林獻堂等人雖然不似蔣渭水般激進，卻也同樣試圖藉由「大亞洲主義」的論述以獲得台人的政治利益。

總而言之，每每在日本大興大亞細亞主義風潮之際，台人便每每從其論述矛盾之處著手，援引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意涵與精神，作爲與大亞細亞主義對話與對抗的理論根據。然而，進入了 1937 年的戰爭期後，大亞細亞主義膨脹成爲「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論述，台人欲藉「大亞洲主義」爭取民族平等的機會已不復存在。當然，這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然已超越本文所能負載的範圍，有待日後再做論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台灣民報》（1923a）。〈漢文振興案通過眾議院了〉1(1)：1。

《台灣民報》（1923b）。〈唱設台話文研究會〉1(1)：29。

《台灣民報》（1924a）。〈孫文排日觀〉2(8)：7-8。

《台灣民報》（1924b）。〈美排日法案的內容〉2(9)：8。

《台灣民報》（1924c）。〈米貨排斥的運動〉2(10)：4。

《台灣民報》(1924d)。〈民國日報的人種偏見見絕滅論〉2(10)：13。

《台灣民報》(1924e)。〈亞細亞當聯盟對抗白人之橫暴〉2(10)：13。

《台灣民報》（1924f）。〈由酣睡中大亞細亞的覺醒和白人侵略的抗拒〉2(12)：5-6。

《台灣民報》(1924g)。〈廣東國民黨致日本國民之忠告書〉2(15)：2。

《台灣民報》（1924h）。〈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治安警察法違反嫌疑的公判〉2(16)：2-22。

《台灣民報》（1924i）。〈印度蝦斯篤里演詞〉2(17)：9。

一舟（1924）。〈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台灣民報》2(9)：1。

丘引夫、陳臥子、丘天羽、何子政(譯)，小寺謙吉(原著)(1917)。《併吞中國論》（原名《大亞細亞主義論》）。橫濱：華商印務公司。

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a）。《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原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王乃信等（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原著）（2006b）。《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原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王敏川（1924a）。〈台人重大的使命〉，《台灣民報》2(14)：1。

王敏川（1924b）。〈獎勵漢文的普及〉，《台灣民報》2(25)：1。

王敏川（2002）。台灣史研究會（編），《王敏川選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王敏川（譯），神田正雄（原著）（1924）。〈排日法和全亞細亞的問題〉，《台灣民報》2(17)：6。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中國百城書舍（譯），小寺謙吉（原著）（1918）。《大亞細亞主義論》。東京：百城書社。

君實（譯），原作者不詳（1917）。〈亞細亞主義〉，《東方》14(10)：17-20。

李大釗（1999a）。《李大釗全集㈡》。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大釗（1999b）。《李大釗全集㈢》。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玉貞（1996）。《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呈祿（1923）。〈創刊詞〉，《台灣民報》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獻堂（2000）。《灌園先生日記㈦》。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吳叡人（2001）。〈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43-109。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吳叡人（譯），Anderson, Benedict（原著）（2003）。《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

孫中山（1926）。〈大亞洲主義〉，黃昌毅（編），《中山先生文集》，頁 361-372。上海：民智書局。

高　勞（譯），浮田和民（原著）（1918）。〈新亞細亞主義〉，《東方》15(11)：9-20。

桑　兵（2009）。〈排日移民法案與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誕辰 14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章錫琛（譯），原作者不詳（1916）。〈大亞細亞主義之運命〉，《東方》13(5)：16。

陳端明（1979）。〈日用文鼓吹論〉，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

區建英、劉岳兵（譯），丸山真男（原著）（2009）。《日本的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超　今（1923）。〈田總督訪問記〉，《台灣民報》1(1)：11-12。

游勝冠（2000）。《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文化抗爭》，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曾一士（編）（2005）。《孫中山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父紀念館。

黃煌雄（2006）。《蔣渭水傳：台灣的孫中山》。台北：時報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出版社。

趙勳達（2010）。〈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的啓發〉，「第二屆蔣渭水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2010 年 10 月 17 日。

蔡培火（2000）。張漢裕（編）。《蔡培火全集㈠ 家世生平與交友》。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蔣渭水（2005）。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全二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戴季陶（1925）。〈就日本的東洋政策而言〉，《台灣民報》3(11)：10-12。

二、日文文獻

藤井昇三（1983）。《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勁草書房。

陳逢源（1923）。〈地方分權主義の國策を確立せよ〉，《台灣》4(3)：51-53。

陳逢源（1923a）。〈植民政策としての友聯主義：柴田氏の「台灣同化策論」を讀みて〉，《台灣》4(5)：55-59。

岡倉天心（1976）。《岡倉天心集》。東京：筑摩書房。

竹內好（1963）。《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a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n Yat-sen's Pan-Asianism in Taiwan (1924-1937)

Chao, Hsun-ta*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late 19th century, Japan had developed a Pan-Asianist discourse. However, Japanese visions of a union of Asian nations implicitly endorsed Japan's hegemony over Asia. In 1924, the Pan-Asianist vision outlined by Dr. Sun Yat-sen represented a critical alternative to Japanese Pan-Asianism and a challenge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the region. Dr. Sun's ideal of emanacipation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found support in Taiwan, which was still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Japan experienced three waves of interest in Pan-Asianism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s passage of anti-Asian immigration legislation in 1924, and Japan's withdrawal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1933. While Taiwanese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wave, beginning in 1924 they attempted to discuss and even to oppose Japan's imperialist version of Pan-Asianism. While Pan-Asianism

* Post-doc Fellow at the Humanities Cente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10-)
Post-doc fellow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9-2010)
Phd Degree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003-2009)
Research interests: Taiwanese Literature, Marxism, Postcolonialism
Email: antoniojaw@yahoo.com.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s used by Japan to promote Tokyo's imperialist ambitions, it also galvanized Taiwan's pursuit of national equality. As they engaged with the Japanese Pan-Asianist discourse, Taiwanese referenced Dr. Sun's Pan-Asian thought to advance their pursuit of national equality. However, as the world lurched again toward war, Dr. Sun's idealistic Pan-Asianism lost its appeal. By 1937, when Japan began forcibly implementing its imperialist plan to create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r. Sun's alternative Pan-Asian vision no longer provided a source of resistance for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Sun Yat-sen, Pan-Asianism,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Colonial Taiw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